

“卡夫丁峡谷”理论视域下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历程

程恩慧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马克思主义真理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卡夫丁峡谷”揭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社会发展道路的可能性。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实现了“跨越峡谷”。邓小平把握住了“跨越峡谷”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症候, 通过改革开放填平了峡谷的生产力鸿沟。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 它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 是在“跨越峡谷”“填平峡谷”后对更高生产力、生产关系的重塑, 是“峡谷再造”的过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秉承马克思主义真理, 在继承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等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 “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 A 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4)04-0356-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0107011](https://doi.org/10.13256/j.cnki.jusst.sse.220107011)

The Logical Course of over A Hundred Years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Caudine Forks”

CHENG Enhui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he truth of Marxism is the unity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and its theory of “Caudine Forks” shows a possible path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estern European society. Mao Zedong fully recognized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is combination of the universal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China’s specific social reality led to the victory of revolution by “crossing the canyon”. Deng Xiaoping realized the productivity symptoms of the socialist society after “crossing the canyon” and filled the productivity gap in the canyon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 up. After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2012,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a new era of “the people’s yearning for a better life”, aiming at “crossing the canyon” and “filling the canyon” again by reshaping of high productivity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a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收稿日期: 2022-01-07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 (2023ZSS028)

作者简介: 程恩慧, 男, 讲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E-mail: huiencheng@163.co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is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on the basis of Marx, Mao Zedong, Deng Xiaoping and other Marxists heritage.

Keywords: “Caudine Fork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productivity

中国共产党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历程是一部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史诗，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中国传承，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条逻辑主线贯穿于百余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从马克思的文本一直延伸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提出“卡夫丁峡谷”为理论原点，百余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程实际上是“跨越峡谷”“填平峡谷”“峡谷再造”的过程，梳理这条逻辑主线对我们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提出峡谷”：真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马克思主义指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道路，然而这种道路在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中的实现方式却并不是一般的、普遍性的，而是具体的、多样的。马克思早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对那些将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理论普遍一般化的做法进行了澄清：“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130} 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将“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268}。马克思从没有认为一切民族都会像设定的固定程序一样按照同一个标准、同一个时间、同一种方式进入同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是迂回式的、曲折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原则上的规定性，而不是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讨论的问题一直都集中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这使得马克思在阐释自身理论时毫无必要在“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前面加上“西欧”两个

字，这里的“资本主义社会”指的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然而，当马克思的文本传播到这个被视为欧洲国家，但却是落后的、具有浓厚的东方社会气息的俄国时，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被视为“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简称的“社会”就发生了语义学上的混淆。在俄国理论家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等文本中明确提到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就是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吗？但是俄国的资本主义社会还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笔下所指称的那个自由劳动力、商品经济以及私有制充斥的“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

当维·伊·查苏利奇向马克思询问西欧资本主义的普遍道路是否适用于俄国时，马克思为回复维·伊·查苏利奇打了三份草稿，我们可以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看到马克思发现一种新的革命可能性时的欣喜，“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1]431}。马克思在“复信草稿初稿—二稿—三稿”中对俄国农村公社进行了详实的分析，认为原始公社的解体和俄国现有的农村公社完全是两回事，原始公社解体的因素在俄国的历史条件中完全是找不到的。俄国不是西欧资本主义世界的“猎获物”，而是“与世隔绝的小天地”，正是俄国农村公社特有的性质使得它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1]451}。但是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三份加起来近万字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在正式复信中被压缩到七百字，“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文字表述在篇幅短小的复信中也被删掉了。但这并不足以影响“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光辉，因为正式复信的总基调是“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1]269}，正是这样一个新生支点为俄国革命开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也不是理论的迟疑，而是理论的审慎。马克思在回复给维·伊·查苏利奇时查阅了大量关于东方社会的文献，将俄国农村公社与原始公社、东印度社会进行了比较，正如马克思指出公社有各种各样的公社，他们的社会结构、结构类型、存在时间

以及解体因素也都各不相同。试图为现实性的杂多找到一条唯一普遍适用的绝对规律既是不明智,同时也会遭到现实的反对,因为真理从来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基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提出的一条不同于西欧社会发展道路的另一种可能性。西欧意义上的社会发展进程从不是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也不可能完全按照预先设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革命的进程是蜿蜒曲折的,甚至有时是倒退的,而这一切都以世界各国的现实具体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设想,列宁在俄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创者则是毛泽东。

二、“跨越峡谷”: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中国人民能否跨越马克思提出的“卡夫丁峡谷”,关键在于能否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要认清这一点首先就要意识到“跨越峡谷”同时包含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跌入峡谷”,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盲动主义、非无产阶级思想都是这条“峡谷”中的危险因素。只有不断地清除认识中国革命特殊性的障碍,才能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首先,要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115}“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点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2]111}要提出一个对于革命实践具体可行的方案,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深知1848年的法国、1917年的俄国与1930年的中国虽然都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是国内的情形、阶级力量和敌我力量的差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秉承的就是教条主义,主张与敌人进行总决战,先后上演了“军事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最终使得红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被迫撤

出中央苏区。他们在处理革命实践问题时,不是依据当下的实际情况,而是“开口闭口‘拿本本来’”^{[2]111}。在他们眼里,马克思的文本就是行动的唯一依据,是不以任何时间、地点为转移的普遍真理。毛泽东将这种只知道用文本去处理现实问题的教条主义做法称为“本本主义”,这种“左”倾主义的思想路线在遵义会议以后才得到纠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开始在党内确立。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如果对于一个问题没有进行深入调查就不能对问题的本质有一个全面的、具体的了解,停留于书斋里的文本想象所能触动的不过是那些同样囿于思想抽象的“王明”们罢了。“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2]110-111}毛泽东不仅教导我们“正确的认识源于调查实践”,更为我们指出了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定调查纲目”“讨论式的调查”“亲自出马”“人多人少看情况”“做记录”等^{[2]116-118},《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就是毛泽东调查实践方法的经典案例。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特别是农民阶级的分析,为我们“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而包围城市”提供了具体性的实践指南。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中国化的第一步,它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扫清了认识上的第一重障碍。

其次,要认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具有其他无产阶级革命所具有的普遍性。然而中国革命的实践却证明,照搬照抄他国经验只能断送革命本身,究其原因在于未能把握住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第一,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源于中国的革命现实。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准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就是要理解中国革命现实的特殊性:这是一个帝国主义势力多方博弈、国内军阀相互斗争,而农民问题又是革命的关键问题的现实场域。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给予了革命回旋的余地,只要把握革命现实的特殊性,中国同样可以像俄国一样实现“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外国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强弱直接决定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弱,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摧毁了中国的“万里长城”,但是与资产阶级相对应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却依然弱小。他们不仅在数量上不占据优势,甚至在阶级意识形态上也受到农民阶级、小资

产阶级的影响。第二，要辩证认识工人与农民的同盟关系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而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工人阶级。“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中国因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2]7-8}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但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又决定了其“不能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因此在党组织的队伍中，不仅包括工人无产阶级，同时也包括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小贩、店员），他们在充实无产阶级队伍的同时也带了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第三，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要斗争、要教育。任何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都与产生它的物质基础密不可分，中国的社会现实同样使得加入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部分人依然保留了它所在阶级的一些思想观念。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就曾批评过红四方面军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认为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阻碍了无产阶级政党赋予革命军队的使命任务，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就要实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澄清。毛泽东认为红四方面军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大方面：混淆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认为军事决定政治，不认为军事是政治的工具，最终的目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认为共产主义就是平均主义，搞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非组织、个人主义观点，当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与自身或者小团体的意愿相左时，就搞打击报复、消极执行、盲动蛮干^{[2]85-95}。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就要与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划清界限，使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能够始终成为革命队伍的主要意识形态，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最后，制定正确的革命策略。从理论上认清革命的任务是革命的第一步，然而如何将革命的任务转化为革命的实践才是革命的重中之重。邓小平在回忆党在历史发展进程时将其概括为“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3]254}。第一，要辩证地看待各阶级之间的敌我关系。“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2]3}既要看到民族资产阶级的相对软弱和摇摆不定，又要看到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对帝

国主义的依赖，要将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分为“可以团结的”和“坚决反对的”，而不应该盲目地认为无产阶级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依靠力量，但必须始终确保这种“依靠”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否则就会丧失革命的方向。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幻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不仅不会成为革命的敌人，反而会成为革命的朋友。第二，要正确认识战略与战术，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2]225}在敌我力量悬殊时，不能“避其锐气，击其惰归”，节节抵御、短兵突击只会使得革命陷入危险的境地。这种“革命急性病”在革命陷入危机时又会转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2]206}。战略与战术之间的关系与战略退却密切相关，并不断地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毛泽东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指出：“当革命的形式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2]152}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的策略，敌人军事力量的强大决定了我们不能用“阵地战”跟敌人拼消耗，而要采取“运动战”的策略；中国地域广阔，敌对力量之间相互掣肘给予了我们战略迂回的空间；进攻与防御不能考虑一时的阵地得失，而是要在保存有生力量的战略全局上统筹考虑。这种“战略退却”“诱敌深入”的意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体现得更为详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正是由于那些“御敌于国门之外”“两个拳头打人”“不丧失寸土”的“革命急性病”吗？第三，要紧紧依靠人民，革命战争归根到底是一场人民战争。“工农民主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只有放到中国的革命现实情境中才是可能的、可以理解的。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境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可能性，然而深处革命现实的革命同志却很容易染上“革命急性病”，他们因反革命力量的强大而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而没有看到人民的力量。无论是帝国主义还是国内军阀，他们都在军事实力上远胜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他们在外表上将自己武装到牙齿，然而这种“铜墙铁壁”背后却是人民群众的离心向背。“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真正的铜墙铁

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2]139}只有立足于人民群众,我们才能透过表象看本质,即反革命力量的“强”是“相对的”

“一时的”。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在军事力量上是相对强的,但是帝国主义之间以及军阀之间的利益是相互矛盾的,这种相互矛盾决定了这种“相对强”只能是“一时强”,革命的力量虽然弱小,但是有了人民群众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就会发展得很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对比不能仅仅看到当前的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要看到这种力量是否取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人民群众才是革命的最终决定力量。

三、“填平峡谷”:一项全新的事业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不断同各种“左”的、右的错误思想作斗争,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建立了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我们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也经历一些曲折,只有真正认识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时,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事业才逐渐走上了正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它不同于革命时期的敌我斗争,而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最注重发展生产力。”^{[3]63}跨越了“峡谷”并不代表消灭了“峡谷”本身,“峡谷”依然存在,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填平峡谷”。

在“填平峡谷”的全新事业中,我们同样面临各种“左”的、右的错误思想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在“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下,未能将工作的中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将革命时代处理问题的方式机械地代入改革建设的时代,是“革命急性病”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的另一种表现。要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首先就要澄清“左”的错误思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左”的错误使得我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未能抓住发展的时机,与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发展形成了较大的反差。“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3]63}

停留在“左”的错误思想的争论中不仅不会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反而会使得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竞赛”中处于劣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就无从谈起了。计划和市场是否具有制度的属性?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会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对于这些社会主义改革建设中遇到的尖锐问题,我们要给予回答,但是我们决不能停留在这些争论中。争论是为了搞清楚问题,而一旦搞清楚了问题,就要付诸实践。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较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不能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而不是贫穷”。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发展与我们停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六七十年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邓小平深刻地领会到了时机的重要性,“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3]375}。“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3]37}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们在解决好“左”的错误思想后又面临来自右的方面的侵蚀。沿海经济特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到了快速发展,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活力,改革开放释放了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也滋生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土壤。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本主义的精神污染。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持放任态度不仅不会解决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反而会使得西方所谓的和平演变得逞。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滋生归根到底是没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没有深刻认识到

“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3]207}。因此,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就要在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有人把邓小平视为改革派时,邓小平说“我是改革派,不错”,但有人说邓小平是“保守派”,因为他坚守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说“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3]209}。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以及其他重要场合都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3]382},这是我们从毛泽东思想那里继承过来的最为重要的原则。“实事求是”同样是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的关键概念,因为正是在“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引下我们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为“填平峡谷”奠定了理论基础。

当马克思认为贫穷落后的俄国有可能直接越过

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时，马克思那里就呈现出了两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制度：一种是《资本论》意义上已经充分吸收资本主义发展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一种是有待于继续吸收资本主义发展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4]。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跨越，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跨越。而在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跨越之后，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制度同样需要吸收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成果，进而借助新的生产关系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双重跨越^[5]。

这种论点最为直接的论据源于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马克思说：“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451}这句话实际上包含两个要点：第一，要“吸收成果”；第二，“成果”是什么？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否定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用公有制代替了私有制，而这主要体现在生产关系领域。“吸收成果”实际上指的是吸收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如果我们依然对何种“成果”持有疑虑的话，马克思“吸收成果”这句话后面的文本就为我们具体指出了这种“成果”是什么。马克思说：“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6]451}在机器大工业蓬勃发展的时代，马克思认为“机器”就是俄国可以吸收的“成果”。那么在机器大工业之后的信息科技时代，我们是不是同样可以吸收科学技术的成果呢？答案是肯定的。

“机器”是马克思在狭义意义表述的“生产力”，如果我们在广义的意义上理解“机器”，这句话就会变为“俄国可以使用资本主义先进的生产力”。在《资本论》的理论视域中，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结果。因此，《资本论》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已经完成了生产力发展的任务，实现社会主义的转变要解决的主要是生产关系。而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首先完成就是生产关系的任务。生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生产力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社会关系可以通过革命的、人为的方式实现跨越式的改变，而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则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积累，虽然它也与人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人对自然规律的一种把握。因此，当邓小平提出“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时，他就正确地把握了生产力的本质，而生产力恰恰是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变革后的中国所急需解决的问题。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论断抓住了“生产力”这个牛鼻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源”^[4]。邓小平理论及其之后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也把握住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生产力症候。

四、“峡谷再造”：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自197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我们在经济建设领域取得了令世界惊叹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十分显著的提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们党对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基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各项成果，再谈“落后的生产力”已不符合我国的现状，生产力有无的问题已经转变为了“更高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更高生产关系”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在这样新的历史时代条件下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不仅使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更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文明类型。这种新的文明类型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是在“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对“更高生产力”以及“更高生产关系”的重塑。

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得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着质的提升，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环境、更优美的环境”^{[6]4}。“更”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是对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逻辑进行了提升。国内生产力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体现的是“不充分”，沿海与中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距体现的是“不平衡”。要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要一手抓生产力的不充分，一手抓生产关系的不平衡。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时指出,要“勇于自我革命,当改革的促进派实干家”^{[7]104}。改革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各个领域:在经济上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更要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在政治上要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化上要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始终把民生作为人民中心的落脚点,脱贫攻坚如期建成小康社会;生态上要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弊端,为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努力。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是对生产力问题与生产关系问题相互交织下的新时代问题的“最优解”。生态问题被提升为战略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是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次重新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是为了解决生产力与消费力不均衡问题,更是对资源消耗型发展模式的反思,同时也是实现中西部均衡发展的一大举措。脱贫攻坚如期建成小康社会,体现的是对中西部地区的生产力关切,更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的彰显。

五、结语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3]373}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鼓励深圳等沿海经济特区大胆试、大胆闯,从而优先发展起来,因为当时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发展落后的生产力。但是邓小平从没有把“优先发展”作为全部的社会主义任务,“优先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一步,沿海等经济特区发展起来后要帮助其他地区发展起来,最终的目标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讲话中对这种人

民的立场再次给予了强调,在新的社会主义征程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8]。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对人民立场的多次强调,以及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要实现的就是邓小平给出的第二个任务,在“优先发展”之后,实现“共同富裕”。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秉承马克思主义真理,在继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 张凌云.怎样合理解马克思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与许明先生商榷[J].探索与争鸣,2014(2):28-33.
- [5] 张赛群,汤兆云.是社会制度的逾越,抑或是生产关系的逾越——马克思“卡夫丁峡谷设想”新解[J].科学社会主义,2012(5):39-42.
-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18.
- [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17.
- [8]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7-02(001).

(责编:程爱婕)